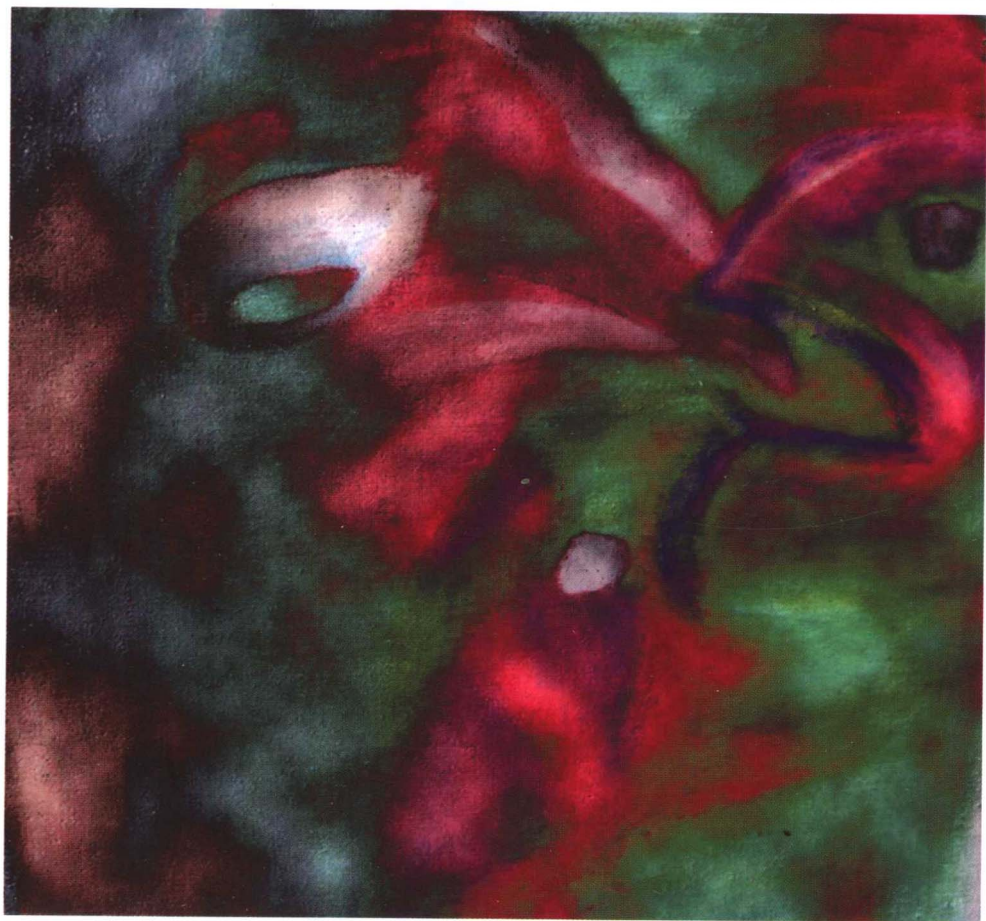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上最疼我的 那个人去了



张洁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世界上最疼我的 那个人去了

张洁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/张洁 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6

ISBN 7-02-005539-7

I. 世… II. 张… III. 散文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1281 号

责任编辑:杨 柳

美术编辑:刘 静

责任校对:段志坚
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

Shi Jie Shang Zui Teng Wo De
Na Ge Ren Qu Le

张洁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22 千字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插页 4

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0

ISBN 7-02-005539-7

定价 29.00 元



作 者 像



一九九一年七月底，妈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衰老了，身体也分崩离析地说垮就垮了。好像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就不行了，连个渐进的过程也没有。

而妈可能早有预感。

妈去世后，唐棣学生时代的好友石晓梅对我说，六月份她来看妈的时候，就觉得妈明显地衰老了。妈去拿笔记本，想要记下晓梅的电话。可是刚拿出笔记本就茫然问道：“我拿笔记本干什么？”

晓梅说：“您不是要记我的电话吗？”

就是这次，妈伤感地对晓梅说：“我再也看不见唐棣了。”

晓梅说，以前妈也常说这样的话，但她从未介意，因为上了年纪的人常有如是之说。可是这次，妈再这样说的时候，晓梅觉得她是真的再也看不见唐棣了。

一九八七年妈得黄疸型肝炎以后，我每半年带她做一次B超，检查她的肝、脾、肠、子宫等等，医生每次都说她什么病也没有，一定能活到一百岁。

我虽然不敢奢望妈活到一百岁，我想她活到九十岁、九十五岁，是不成问题的。

我这样盲目地乐观，还可能是因为妈太自强、太不需要我的关照，什么事都自己做。就在一九八七年秋天因为黄疸型肝炎住进医院的前几天，她还自己步行到魏公村口腔医院看牙呢；

就在妈去世前的五六个月，还给我熬中药呢；

就连胡容都看出，一九八四年唐棣走后，妈老了一大截。一九八七年得了黄疸型肝炎后，又明显地老了一截。而我却总是看



母亲婚后三天的照片。一九三五年春。



母亲。一九四一年，柳州。



不到妈的衰老,我对她的关心,是不是连外人都不如?

医生的良好祝愿正中下怀地鼓舞了我、欢愉了我,从而也麻痹了我。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,从而忽略了妈毕竟是八十岁的老人,以致我大意失荆州。这可能也是造成妈过早地去世的原因之一。

而且我那时不知为什么愚蠢地认为,那个半年一次的B超检查,就是妈整个健康状况的鉴定,既然做B超的医生说她什么病也没有,她就真是什么问题也没有了。我现在悔之晚矣地悟到,其实B超了解的只是腹腔方面的情况,其于心、肺、脑方面的情况还是一无所知。以我的智力,这本是略动脑筋就能想到的事,然而我却没有想到。

我算是大不孝了。

妈年事渐高以后,我并没有经常守在她的身旁,而是把她丢给小阿姨,或游走异国他乡、或应酬交际、或忙于写作、或去陪伴我的先生……以为有小阿姨在她身边,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

尽管现在我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把妈的一点骨灰带上,可这还有什么用呢?在她老迈力衰,最需要我在她左右的时候,我却把她远远地丢下了。

一九九一年七月初我到黑龙江大庆采油七厂采访,她比我哪一次外出都更想念我。听小阿姨说,她不断地说:“张洁快回来了,张洁快回来了。”好像在为无人照应的自己鼓劲。

可是我在大庆给妈打长途电话,问她各方面情况如何的时候,她老是说:“没事,挺好的。”

有一次妈便结得特别厉害,急迫地念叨着:“张洁要是在就好了,张洁要是在就好了。”而我却远在大庆。

多少年来都以为妈的便结是老年人的通病,后来才知道,那是由于她的脑垂体瘤已经影响到了她的内分泌系统,从而影响了身体各系统的功能的缘故。



妈从不要求我的关照,从不抱怨我在她八十岁的高龄,还总是大撒手地把她丢给小阿姨。

妈终于禁不住对小阿姨这样念叨我,一定是因为身体异常不适,有一种到了紧要关头的直觉。

我在黑龙江呆了不过十几天。一到家就发现,短短十天里妈就颤颤巍巍地塌了腰。走起路来磕磕绊绊,举步维艰,两只脚掌嚓嚓地磨蹭着地面。裤带也常常忘了系,吊吊地拖垂在衬衣下摆的外面。

妈再不是那个不管什么时候都利利索索的妈了。

可我还是想不到,或不愿意那么想:妈是不行了。我还以为,或我宁愿以为她不过是在懈怠自己。

我说:“妈,您怎么这样走路?好好走。”

或者我在内心深处已模模糊糊地感到,妈也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?尽管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妈能活到九十五,但是为什么一见妈那样走路我就心里发紧?我心里越是发紧,却越是轻描淡写地对妈说:“妈,好好走。”

妈就抵赖、隐瞒、解释着,说她脚底疼,或是鞋不合适,或是刚睡起来、刚坐起来,腿脚还没活动开……

也许妈心里早就明白,否则为什么老是找出各种理由来蒙混我,也蒙混她自己——那可怕的结局不可避免地快要到来。

那个时候妈大概就知道她已经不行了。可是她不肯对我说实话,她怕我受不了这个打击——一直是互相搀扶才挣扎过来的,只有我们两个人组成的这个队列,即将剩下我一个人了。

所以妈的抵赖、隐瞒、解释里,总含着隐隐的歉疚。好像她不但不能再扶我一把,反倒把我一个人丢下,让我独自在这实在没有多少乐趣,甚至苦不堪言的人生里继续跋涉、挣扎,是她对我的一种背弃。

妈的两只眼睛,总是老泪凄凄的。



母亲。一九四二年冬。



母亲。一九五一年元月二十四日,陕西蔡家坡。



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听信眼科医生的话,妈的视力不好,是因为长了白内障的缘故。而白内障一定要在它的翳子蒙上整个眼睛后才能手术。我们不懂,不懂也没问个明白,为什么十几年过去,妈的视力差不多等于零了,翳子还没有蒙上她的眼睛?

有两次胡容来看妈,恰好我不在家。她应声开门之后竟看不清是胡容,问道:“你找谁呀?”

胡容说:“姥姥,您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?”

妈说:“哎呀,听声音才听出来是你。”

到一九九一年更是出现了重影。妈常说,有时能看见两个我,有时半夜醒来,老看见屋子里有人,或有几个小孩子在乱跑。“刚开始我还挺害怕,后来就习惯了。”妈说。

现在,不用念医学院我也懂了,一个人的眼睛如果查不出别的毛病,视力却越来越差的话,就应该考虑是否是瘤子压迫视神经的缘故。可是却没有一个念医学院的眼科医生想到这一点。说他们是庸医恐怕不够公正,只能说他们没有想到。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位能够研究一下,一个视力已经近乎零的白内障患者,她的翳子还蒙不上整个眼睛,是否和脑子里发生占位性的病变,压迫视神经有关?如果那样,妈早在她还可以承受手术的年龄就做手术的话,我现在还有妈。

妈的左肩更加歪斜了。

妈左肩的歪斜,可能是从一九八九年开始的。那一年五月十三号我去意大利的时候还没有发现,后来我从意大利转往美国,并在一九九〇年二月把她接到美国的时候,突然发现她的左肩歪斜了。不过那时远没有一九九一年夏天歪斜得这么厉害。我说:“妈,您的肩膀怎么歪了?”

妈辩解说:“这是因为右手老拄拐杖的缘故,右肩老撑着,左肩就歪塌下去了。”妈几乎不拄拐杖,拐杖拿在她手里只是心理上的一种依赖,哪里是什么“右肩老是撑着,左肩就歪塌下去”。



她只是不肯承认那是衰老的象征。在她辩解的深处，恐怕隐藏着对衰老无力、无奈的忌讳，更主要的是她知道我不愿意她老。

我老是一厢情愿地觉得，妈还是拉扯着我在饥寒交迫、世态炎凉的日子里挣扎、苦斗的母亲。有她在，我永远不会感到无处可去，无所依托。即便是现在，我看上去已经是足够的强大、自立、独立的样子了。只有妈深知，这不过是看上去而已。



张洁五岁，在柳州。

妈也一厢情愿地想着她不能老，更不能走。她要是老了、走了，谁还能像她那样呵护我、疼我、安慰我、倾听我……随时准备着把她的一腔热血都倒给我呢？

随时，我的眼前都能现出妈住进医院的前一天，坚持锻炼的样子：手杖依旧横空地握在右手，她常说：“我不拄，我就是拿着它壮壮胆。”不管命运如何安排，她要以八十岁的老身奋力延缓着依赖他物、他人那个时刻的到来；

发卡胡乱地卡在头发上。稀疏的白发，东一绺、西一绺地四下支棱着。妈是极要体面的人，不管条件、情况怎样，她总是把我和她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。可是，早晚有一天人人都会有的，那个力不从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；

双臂勉力地、尽快地摆动着，好像还在协调地配合着快速、利索，其实举迈已经相当艰难的双腿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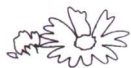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四六年六月，在陕西宝鸡。后中为母亲，前中为张洁。

左为母亲的好友方茵琴，她曾多次帮助贫困中的我们。

蔡家坡扶小教職員合影



一九五〇年元旦，母亲(前排左二)与陕西蔡家坡扶小的同事们。



张洁九岁

妈晃动着双臂往前挣扎着,满脸都是对生命力,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的不明不白、不甘不屈,以及在这毫无胜利指望的斗争中、心力耗尽后的空虚。

妈明显地食欲减退,吃什么都不香了。

而以前妈的胃口总是很好,饭量比我还大。更让人不安的是,我要是不给她夹菜,她就光吃饭。给她夹了菜,她就光吃放在饭上面的菜。我要喂她,她又不肯,就只好把

她碗里的饭菜拌匀了让她吃。

吃饭的时候,眼睛茫然地瞪着前方,不知其味地、机械地往嘴里填着。端碗、拿筷子的手也颤抖得厉害,已经不能准确地把饭菜送到嘴里去。连端碗的样子都变了,不是端,而是用左手的食指抠着碗边,把碗夹在食指、拇指和中指的中间。我纠正她几次,可是没用,下次她还是那么拿碗。

妈的脑子里,好像什么都装不进去了。

妈终日倚在沙发上昏睡,任门户大开。

到现在,妈那昏睡的样子还时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。特别是那一天,我走进她的房间,见她睡得简直昏天黑地。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,干这干那,她也不曾感到丝毫的干扰。她那毛发日渐稀疏的头(妈的头发本来就少,但是不秃),枕在沙发的扶手上。那张沙发是我们经济上刚刚翻身的时候买的,式样老了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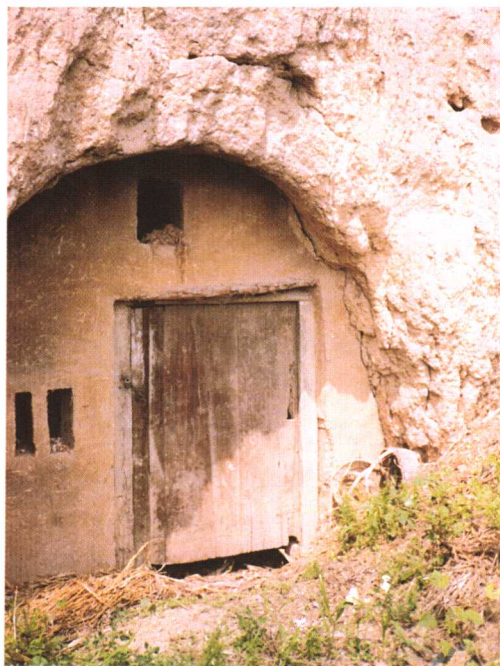


点。扶手比较高,所以她的脖子窝着,下巴自然杵在了颈窝上。嘴巴被杵在颈窝上的下巴挤得瘪瘪地歪吊着,气也透不畅快地呼呼有声。全身差不多摊放在沙发上,好像那不是有一个有生命的躯体,而是没有生命的血肉。

妈不再关心锁没锁门,会不会丢东西;不再像过去那样,不管谁,哪怕是我进门,也要如临大敌地问一声:“谁?!”

就是跟我到了美国,住在我任教那个大学区最安全的教职员公寓里,对公寓里其他人出入不锁门的现象,妈也总是放心不下,多次让我提醒他们注意锁门。我只是随口应承着,并没有认真去做。妈见没有成效,就“提醒”不止。弄急了我就会说:“锁门干什么,谁能来偷咱们或是抢咱们呢?咱们有钱吗?没有。公寓里的家具人家也不会要;咱们的衣服即便偷去也没法穿,尺寸不对。再说,咱们俩不论从哪方面来说,都不对那些歹徒的胃口,您就放心吧。”

妈一生处在无所依靠,不但无人保护,还要保护我的情况下,对门窗的严紧自然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情结。不过她在世的时候我并没有求其甚解,甚至觉得这种过度的谨慎纯属多余。直到妈过世以后,当我细细回顾她的一生的时候,才有些许的感悟。



寒窑——四十五年前,这是我和母亲的家。
张洁一九九一年重访故地。